

金门“海外移民潮”的历史回顾、特征及影响

蔡清辉

(厦门市文联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摘要: 金门是个移民社会, 海外移民具有悠久的历史, 从明朝中后期到1949年, 先后四次大规模的“海外移民潮”, 掀起了闽台历史少有的人口大迁徙运动。本文通过对金门移民潮历史的概要回顾, 分析了其四大主要特征, 即: 爆发式、规模大, 更多缘于逃难避祸; 男性青壮年贫民是海外移民的主要人群, 知识分子更多是内迁; 属于“结伙抱团”“投亲靠友”型的集体性移民; 移民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, 从事职业大多与种植、矿业和贸易有关。阐明了其对当代金门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, 即: 促进了金门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; 强化了金门与海外的联系和多元文化的认同; 加剧了金门优质人口的流失和社会发展的“空心化”; 冲击了金门传统家庭结构和正常的社会体系。

关键词: 金门; 海外移民潮; 历史回顾; 特征; 影响

中图分类号: K26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3-5684(2016)03-0075-06

金门, 旧称浯洲、浯江、浯岛、沧浯等, 由金门本岛、烈屿诸岛组成, 面积仅152平方公里; 位处福建南部九龙江口、厦门湾外, 内捍漳厦、外制台澎, 海洋战略地位重要, 历史上有“固若金汤, 雄镇海门”之誉。金门常住人口不足6万, 而散布在东南亚、日本等地的金门籍华人华侨却达70多万, 在台湾和大陆也多达30万—40万, 内外悬殊之大, 实属罕见。长期以来, 金门人海外移民的相关研究, 除了县志及一般侨社文章记载与提及之外, 鲜有学术成果发表。本研究试图在搜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, 探讨金门“海外移民潮”的历史, 归纳其特征, 并阐

述其对当年乃至当代金门产生的历史性影响。

一、金门“海外移民潮”的历史回顾

金门人海外移民始于何时, 至今尚无确切文献可考。从明中期以来, 金门海外移民前后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。

(一) 第一阶段: 明末清初(约1627—1684年)。金门海外移民记载, 最先出自《金门华侨志》: “有谓自明隆庆、万历以后, 倭寇就歼, 海上安澜, 闽人与安南、暹罗、吕宋交通频繁, 浯民自不例外, 其余斯时附海舶远涉重洋者有之。证以南洋之物产, 如蕃薯等, 明时即已移植本岛, 良足为

收稿日期: 2016-05-16

作者简介: 蔡清辉(1968), 男, 福建莆田人, 厦门市文联研究员、高级记者, 民建厦门市理论与会史研究会副会长, 研究方向: 台海两岸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。

信。”^{[1]95-96}明末,由于明朝政府忙于同清军和农民起义军作战,无暇顾及东南沿海情势,以致闽南人颜思齐、郑芝龙、郑成功的武装海商集团逐渐坐大,先后纵横海上数十年,其活动范围遍及我国东南沿海,也到达日本、吕宋、交趾、苏门答腊、柬埔寨、暹罗等地,金门人参与其中,往来台澎、日本和南洋者,络绎不绝。到了清兵入关、郑成功据金厦两岛抗清,金门人高举反清复明旗帜,纷纷加入明郑军队;郑成功在金门誓师,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;金门人随之东渡,大规模迁移台澎地区。然而,随着郑成功英年早逝和明郑政权多次内讧以及同清军的拉锯战,台海烽烟此起彼伏,尤其康熙二年(1663年)十月,清军攻陷金门,焚屋毁城,疯狂屠杀。“清兵入岛,遗民尚数十万,多遭兵刃”^[2](“遗民尚数十万”指的是金厦两岛的数字,如果以金门诸岛而言,估计十万人以上^[3])。随后,清政府残酷实施了“迁界令”,使金门人生活无以为继,越来越多金门人不得不逃离家园远涉重洋谋生。1683年,清军攻占台湾后,郑克爽降清。明郑虽亡,其魁杰不愿入内地,仍留台湾,而赫赫为清人注目者,均乘船赴小吕宋,转至爪哇、马六甲等处^[4]。清兵攻取台湾后,一群达三千多人的反满志士,携同眷属,分搭九艘帆船开往东南亚各地,其中三艘开抵吕宋,一艘到暹罗,三艘到爪哇,两艘到马六甲^[5]。明郑余部出走南洋,其中有多少金门人,不得而知。

(二)第二阶段:清后期(19世纪40—60年代)。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东南沿海民生凋敝,人民流离失所,加上连年灾荒,金门紧张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,许多人食不果腹;与此同时,东南亚国家大多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,为了开发东南亚,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,由于奴隶贸易被法律普遍禁止,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中国。在殖民主义者的重利引诱和外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外国的投机商人和招工贩子纷纷涌向中国,澳门、香港、厦门、宁波、福州的外国洋行及各通商口岸陆续设立专为等候装船的猪仔馆。各口岸外国洋行、领事相互勾结,采用拐骗、绑架等手段,诱迫生活无着的贫

民签订契约卖身,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,利用他们取得的特权肆无忌惮地贩卖华工。《金门县志》记载了这一次大规模南渡集中于同治年间:“地不足于耕,其无业者,多散之外洋……同治间灾害频仍,连年荒歉,饿殍载道,饥驱浪走,又大批相率逃荒,南渡觅食,是为灾荒迫人之一次大规模移植者”^{[6]96}。1845年3月7日,从厦门开出第一艘苦力船,装了200名苦力,开往法属波旁岛(即留尼汪岛)。1846年,厦门英商德记洋行包揽苦力贸易。德记洋行老板德滴身兼葡、西、荷三国驻华领事,依仗权势,无视中国政府禁止贩卖人口的法令,雇有大批打手,收买拐子、人贩到乡下掳掠苦力,送到厦门的巴拉坑(集中收容苦力的地方),待船运出。巴拉坑内,对苦力施以酷刑,强迫他们签定到外国劳动的卖身契约,并在华工胸前烙上运往目的地的标记。^[7]1860年,清政府与英国、法国等国家陆续签订了北京《续增条约》等,清政府正式确认华人出洋的合法化,致使包括金门在内中国沿海移民人数激增。

(三)第三阶段:民国初期(1912—1929年间)。民国初期,随着中国经济、航运业的发展以及军阀混战、政局动荡,海盗活动猖獗。在1919—1926年间,《申报》报道了大量海盗抢劫案。据不完全统计,民国九年(1920年),《申报》有关海盗事件的报道为三次;民国十年(1921年),有十八件相关报道;民国十一年(1922年),有五件;民国十二年(1923年),有十四件;民国十三年(1924年),二十件;民国十四年(1925年),十二件;民国十五年(1926年),二十件。^[8]当时的海盗,并非只在海面劫持船只,海盗常假扮旅客上船,在船至公海上再展开劫持,造成海盗与良民难辨。这对当时在中国有重大贸易利益的英国等西方国家,威胁很大,由于中国政府打击不力,英国以香港为基地出动皇家海军甚至航空母舰来进剿海盗,由于英军残酷的无区别杀戮,造成东南沿海渔民不敢外出“讨海”。而此时的东南亚相对于中国国内,商业发达、治安良好,一些先期出洋的华侨

在国外发财的消息也传到家乡，引发了村民的羡慕。尤其是1925年文莱诗利亚地区发现第一座油井，极需大量人力开发，从而掀起金门人又一波移民文莱盛况。在致富梦想的诱发、刺激之下，在南洋亲友的鼓动和资助下，金门大批青壮人口纷纷再下南洋谋生，致使人口统计锐减了百分之六十^{[9]166}。这些从《金门县志》记载得到了证实：“民元至十八年时，南洋群岛商业，有如日丽中天，而国内则初创之局，政治建设、地方治安，间多未臻完善。盗贼蠢起，劫掠时闻，岛民既感不安，而南洋又较易谋生。当时出国既无须任何手续，南洋群岛亦无入境之限制，交通便利，来往自由，祇需若干费用，购买船票，即可乘风破浪，放洋而去。”“民国四年人口总数为七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人。至十八年之人口数，只存四万九千六百五十人，锐减至百分之四十。”^{[1]96} 1929年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，大萧条波及南洋各地，这股移民热潮才稍退。

(四) 第四阶段：抗战与国共内战期间（1937—1949年）。金厦历来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战略门户，为了从海上进一步侵入我国内地，1937年10月26日，在飞机和战舰炮火的掩护下，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金门。守卫在滩头的100多名保安队员、壮丁队员，全部壮烈牺牲，金门沦陷。日军占领金门期间，疯狂杀戮掠夺，强奸妇女，强征民工、物资及土地，金门居民时时面临死亡恐怖威胁。如1944年强征民工开辟安歧机场，十三岁以上、五十五岁以下，每日三千名，日军在场监工，对民工酷虐鞭笞，至头破血流。机场以湖南为中心，长五里、宽二里，跑道七千尺、宽五百尺，范围自安歧至湖尾两村之间，耕地被毁甚多^[10]。金门百业萧条，人民生活极端困苦，许多青壮年不愿沦为日军的阶下囚，纷纷逃至南洋投靠亲友。即使一些已经衣锦还乡的归侨们也不得不再次携家带口返回海外。1945年抗战结束，但情形并没有改变，抢劫绑架依然盛行。在此后四年内战期间，随着国民党军在大陆的节节败退，为了补充兵源和财源，他们到处抓壮丁、征钱粮。当时抽丁制度为征集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的男丁，名额为各

县人口(不分男女)的十分之一^{[1]203-205}。加上金门医疗条件差，社会环境恶劣，瘟疫流行。据金门县户口统计资料，在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共有1086人死亡，其死亡原因除了老年性疾病居于高位外，伤寒、鼠疫、猩红热、各类疹病都是导致人口死亡的主要病因。在1948年1—6月，共有448人死亡，其中1—3月鼠疫和霍乱这两种流行病就吞噬了101个生命，占同期死亡总数292人的1/3以上。抓丁和瘟疫，使许多华侨不敢回国探亲，青壮人口被迫纷纷出逃至南洋各地。

二、金门历史上“海外移民潮”的主要特征

历史上“海外移民潮”的形成，大多是由特定的国际、国内环境决定的，金门地区地处闽南偏僻海疆，自然条件恶劣，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更是贫乏，出于生存需要以及各种历史时期的主客观条件，导致移民海外的一次次高潮，在概要回顾这些“海外移民潮”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时，不难发现，其具有显著的四大主要特征：

(一) 爆发式、规模大，更多缘于逃难避祸。由于与台湾一水之隔、四面环海和得天独厚的海上交通条件，历史上的金门，不仅是商家海上贸易的要地，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之一。海盗、倭寇的侵扰和一次又一次的台海战争，加上土地贫瘠和天灾不断，为了躲避战争、灾荒以及瘟疫，历史上金门的海外移民，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缓慢式、小规模上升趋势，而是呈现出一种爆发式、大规模、呈阶段性高潮的迁移趋势。当然，空前的生存压力也是驱使金门人海外谋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；另外一些移民，则因家庭的突然变故而陷入绝境，不得不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。同时，由闽商主导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良性互动，也是推动了闽金门人海外移民的一个原因。

(二) 男性青壮年贫民是海外移民的主要人群，知识分子更多是内迁。金门落番客基本上是缺地失地的农民、破产的小手工业者，大多属于“活不下去”那批人。“去三两年仔，就着倒来”在金门很流行，当时金门男孩子只要年满16—17岁，大

多都要背井离乡下南洋讨生活，寄回钱财安家，关耀门楣。出去时，为减轻负担，已婚的不敢带家眷，一去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，每到送别时，妻子总会掩面哭泣，但因当时风俗保守含蓄，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，又不好意思跟丈夫话别，此时父母就会对儿子说：“去三两年仔，就着倒来”，勉励儿子必须下决心艰苦奋斗，早发财、早荣归，这句话后来流传成训勉人上进的话语。自古以来，金门文风鼎盛，先后出了43位进士，有过“人丁不到百，京官三十六”的美誉。当地殷实人家或知识分子，大多热衷功名，即使逃难避祸，也大多跑往内地，不屑海外移民，因此鲜有知识分子移民海外的记载。

(三)属于“结伙抱团”“投亲靠友”型的集体性移民。自古以来，金门人的宗族观念极强，村落大多以宗亲之别聚合，各姓宗族大事往往都有族谱记载。金门的出洋客当然也不是盲目地漂洋过海，当先期乡亲开辟出迁移路线后，同族、同乡的人便会随之过来投靠，通常都是追随已经在海外发展的亲戚、乡亲等，由最初的零零落落，逐渐形成了群体，并成立会馆等民间组织，在侨居国创业过程中相互提携，合抱成团。后来初到的，也需仰赖早到的同族、同乡，协助安顿、寻找工作和争取权益。一些创业成功的金侨，在他乡开店办厂，也乐于雇用乡亲作为职员，这种“结伙抱团”“投亲靠友”型的集体性移民特征，从金门地方志、族谱或侨刊乡讯中，随处可见。金门人出洋的路线通常从厦门出发，然后乘船南下经越南到达新加坡，随后以新加坡为中转站，再辗转至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地，所以新加坡就成了金门人主要的海外聚集地之一。新加坡金门会馆创立于19世纪70年代，已有140多年的历史，1949年以前，在原乡与异地之间，在战争动乱、治安败坏的特殊背景下，新加坡金门会馆的跨境运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其联络感情、敦睦宗谊、兴办公益、共谋福利的宗旨一直延续至今，比较著名的还有湖峰社浯江公会等。金门人是新加坡一支重要的侨民力量，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(四)移民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，从事职业大多与种植、矿业和贸易有关。金侨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亚，其中又以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文莱和菲律宾居多；文莱大部分的侨民来自烈屿（小金门）。金门人移居南洋，因血缘和地缘关系，移民同一地区、从事同一职业的情况相当普遍。先期移民去海外的多以从事种植业和矿业居多，其次是商贩，其他职业较少；后期的职业，则比较多样化，以工人居多，其他商贩、手工业者、店员也到处可见。相比之下，从事田间农业的较少。在国内曾经是个农民的金门人，到南洋之后都变为种植园或大小市镇里的劳工。少数人通过奋斗还成了店主、农场主、工厂主，个别人甚至还成为资本家、大富翁。根据1971年的统计，海外金侨约有11万余人。返乡定居的归侨，在1966年户籍统计中有22414人，其中男性占绝大部分，有19054人，侨居地则以新加坡的11433人最多，印尼的4657人居次^{[6]99}。直到今天，据非正式估算，海外金侨人口约有七十余万人，远多于岛上现有居民^{[9]167}。

三、金门历史上“海外移民潮”的影响

与我国其它地区的“海外移民潮”一样，移民在海外的金门人，无一例外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爱乡情感，他们一方面积极融入当地社会、与移居国民族并肩开发经济、为当地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；另一方面，“洋装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”，在海外努力保持和维护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传统结构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、家乡的经济发展而殚精竭虑和不懈努力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家乡经济和人文生态，对家乡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影响。

(一)促进了金门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过去，金门华侨家庭一般都是青壮年男子出洋谋生，父母弟妹、妻室儿女大多留居国内，侨汇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对家乡眷属尽孝尽责的一种赡养行为；经济许可的侨胞，还会把这种资助惠及叔伯、姑娘、侄甥等范围更为广泛的亲族；事业有成的，更会通过在家乡造洋楼、捐献、投资等多种方

式,以光宗耀祖、资助公益事业和发展生产。金门历史上多次移民潮,在促进接收国经济发展的同时,也使大量的侨汇源源不断流入金门,不仅提高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,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。华侨在金门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修公路、办运输公司等交通事业以及批信局、商业、金铺、当铺、房地产等传统行业,工业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。可以说,金门早期的建设,基本上依靠当年的出洋客和回乡归侨所作的贡献,就连金门最经典的几大聚落都是由著名的归侨设计捐献。一份统计显示,1949年前后,在侨汇总数中便有多达15%—20%的款项是用来兴建或改善家乡的学校、图书馆、庙宇以及公共设施。^[12]从当时一份记载详实的侨刊《显影》来看,当时的金门华侨对于教育启蒙、防疫与公共卫生、实业发展、治安,乃至进步思想的提倡上,均有很大的贡献。^{[11]159-216}尤其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,金门华侨筹集大批钱财、物资、枪炮、药品资助革命和支援抗日,不少人甚至亲自回国参加战斗,不惜牺牲报效祖国。

(二)强化了金门与海外的联系和多元文化的认同。金门本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偏僻岛屿,历史上先后五次的大规模移民,无疑大大强化了金门与海外的联系。尤其是第一代移民,他们大多拥有浓重的原乡情结,对祖国的认同意识比较强烈,与家乡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。金门侨乡社会的形成,不仅促进了金门跨国和全球性网络的形成,也促进了金门文化与输入国文化的融合生长,对于文化全球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,同时也有利于加强金门与海外的联系。金门海外移民是金门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,是与移居国政府和人民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之一,这对于促进金门与移居国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友谊,加强金门与海外的对话与合作以及促进金门的发展与繁荣,维护台海甚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,都具有重要意义。金门海外移民潮,也带来了多元文化及多重认同的问题。大量移民带来不同的文化,使移入国民族的同质性和共同的价值观遭到挑战。同时,金门移民要融入当

地社会,需要克服许多困难,诸如移居国的语言、风俗习惯、行为方式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。而这些移民很容易把这些文化带回国内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金门本地的文化认同,也可能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及冲突。

(三)加剧了金门优质人口的流失和社会发展的“空心化”。“六亡三在一回头”,揭示了金门海外移民中极其惨烈的现象。海外移民中,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青壮年男子,基本是以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小商贩和渔民为主的劳动者,尽管文化程度不高,但就当年金门社会来说,他们还是当地的“优质人口”。迁移路上的高死亡率和在移居地的滞留率,不仅造成金门当地优质人口的严重流失、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,而且落番者的婚期大多推迟,婚后又长期分居,这必然影响社会生育水平,导致金门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,使金门人口锐减。人口(劳动力)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,直接关系到金门当地经济活力与发展。金门人口大规模外移,短期(数十年内)虽然可以得到可观的侨汇,但随着时间流逝,第一代侨民的去世和第二代、三代与原乡联系的减少和感情的淡漠,侨汇来源也会逐渐枯竭;更为严重的是,由于青壮年劳力的对外输出,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越来越多,农田耕作和渔业生产缺乏劳力,直接造成了金门经济发展的持续落后,社会基础不断被削弱,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潜力、实力和竞争力,加剧了金门社会发展的“空心化”、贫困化和边缘化。

(四)冲击了金门传统家庭结构和正常的社会体系。安土重迁思想在金门一直深入人心。早期金门移民,绝大部分都是未婚的男性青年。尽管他们在异国他乡打拼,但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赚够了钱回家娶妻生子、盖房以光宗耀祖,很少有人愿意呆在异乡奋斗终老。等到好不容易攒够了钱,回家成婚生子,可没有几年,又要抛妻别子重新出来谋生,留在家乡的老人、妻子和儿女,不仅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,还使他们的身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一些人耐不了寂寞,常会在海外再行结婚,配偶一般是土

著妇女，这就形成了国内和海外的双边家庭。这种家庭为当年金门社会所认可，经济许可的话，丈夫通常在间隔两三年或几年的时间回家一趟，与结发妻子和儿女团聚。在东南亚新娶的土著妻子，一般不会干预丈夫的国内生活。而在原乡金门的留守妇女，不仅备受牵挂丈夫安危和思念之苦，上要服侍老人，下要抚养子女，又要田间劳作，而且还要直面丈夫另立家庭的痛苦。金门人传统重视长子，长子一般是家庭和家族的“顶梁柱”。许多金侨，一旦事业有成，通常也会把与发妻所生的长子接到海外继承家业。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，一些缺少儿子的家庭，也会通过抱养或过继别人的儿子来延续香火和壮大家业。因此，抱养孩子和招婿上门，在金门十分普遍。由于长时间分离，夫妻团聚、父子团圆在早期金门落番客那里，都是十分奢侈的事，一些人尽管住上豪华洋楼，心里依然空落。同时，由于男人外出落番或死亡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盗匪在金门的猖獗。

四、结语

历史上金门四次“海外移民潮”，与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。金门海外移民潮所呈现出的数量、特征以及影响力，体现了在祖国遭受不幸的前提下，民不聊生的老百姓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不得不自行逃难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向世界。金门历史上海外移民潮，对金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随着大陆实力的不断上升，金门人口开始向厦门等大陆城市迁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金门既是闽南地区著名的侨乡，又是国内移民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，这方面的探讨今后尤其值得关注。我们在回顾金门海外移民潮历史的同时，台海两岸的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人群能力之发挥，在促进金门经济和社会发展、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伟大事业中，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金门县文献委员会.金门县志：卷七 华侨志[M].金门：[出版者不详]，1960.
- [2] 阮昊锡.海上见闻录定本[M].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2：52.
- [3] 杨彦杰.历史上大陆向金门的移民及其人口分析[J].福建论坛(人文社会科学版)，2000(1):30-36.
- [4] 温雄飞.南洋华侨史[M].上海：东方印书馆，1929：91.
- [5] 颜清煌.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[M].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2：16.
- [6] 金门县文献委员会.金门华侨志[M].金门：[出版者不详]，2002.
- [7] 刘敏.晚清华工出洋程序考[J].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，2010(2):46-48.
- [8] 王华锋.试论民国初期（1919—1926）的中国海盗问题[J].兰台世界，2012(25):62-63.
- [9] 江柏炜.台湾研究的新版图：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“金门学”之价值[C]//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.守望与传承——第四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0.
- [10] 金门县政府.金门县志：卷九 兵事志[M].金门：[出版者不详]，1992：1236.
- [11] 江柏炜.侨刊史料中的金门(1920s-40s):珠山《显影》(shining)之考察[J].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,2005, 17(1).
- [12] 陈达.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[M].长沙：商务印书馆，1938：121.

(责任编辑：袁 绚)